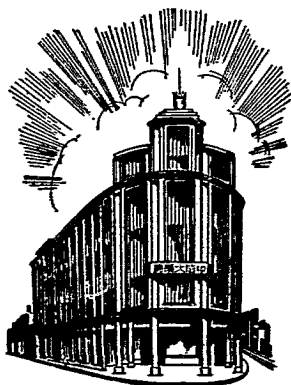


陳納德著

# 論美國對華政策

申報館印行

#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總店

董事長 趙棣華  
 總經理 許曉初  
 廠長 周夢白  
 副廠長 沈濟川  
 主任藥師 吳冠民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  
 水泥大廈，電話九三三三……三  
 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

## 總製造廠

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  
 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  
 經驗豐富。

## 分店分廠

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  
 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  
 ，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  
 公司一所。

##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  
 ，艾羅療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  
 四藥膏，亨嗽伏，胃腎，果導，波  
 痛，蜂窠淨，癩疥，羅威水果鹽，  
 羅威沙而，及百吉牌各種醫用針藥  
 化學合成製劑，暨孩兒面，雙獅牌  
 花露水等藥品化妝品不下五百餘種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  
 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  
 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 創設簡史

## 聯繫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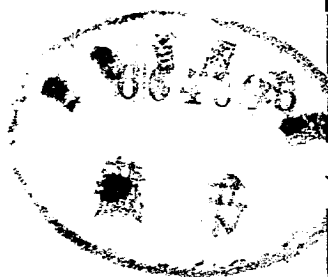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華製藥公司，  
 中法油脂製煉廠，中法血清菌苗廠  
 ，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  
 究所等。



上海總廠

陳納德著

# 論美國對華政策



申報館印行

F972.2

0863

## 前言

最近一年來，回憶錄的出版非常盛行，這是大戰之後應有的現象。戰時許多重要領袖，一定有不少珍聞秘錄，當時因格於環境，無法發表，但在時過境遷之後，就不妨公諸於世，而通過回憶錄的形式加以追述，實在是最佳體的。這些回憶錄中所敘述的事實，比普通的歷史著作來得詳細，親切，可以補正史的不足，而其中所獨有的秘聞，至今仍具有新聞的價值，所以在出版之後往往不脛而走，實非無因。

在本書的十八篇文字中，陳納德將軍把他協助中國抗戰期間的珍貴經驗，作詳細的追敘，並摻雜他對中國問題的見解，所以也是屬於回憶錄的一類。本書版權，係克里浦斯，霍華德系報紙所有，由本報取得在華獨家翻譯權，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四日曾連續在本報發表過，今復應讀者要求集成冊，發行單行本。

陳納德將軍，對於國人當然是很熟悉的，毋庸作詳細的介紹。中國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曾組織志願航空隊，招請美國志願飛行員來華，協助中國抵抗日寇。從一九四二年七月起，他就正式擔任第十四航空隊司令，設總部於昆明，屢挫強敵，厥功甚偉。猶憶國軍自漢口西撤之後，內地各都市，在日本空軍的空襲威脅之下，成爲恐怖世界。後來靠了第十四航空隊的威力，始得轉危爲安，所以當地民衆對陳納德將軍的愛戴，實在是一種至誠的表現。但是陳將軍並不以消極地防衛爲滿足，他復在中國內地遍設空軍基地，監視日本空軍的行動，終

於從極不利的頹勢中轉而取得中國上空的制空權，這種遠大的識見和果敢的精神，的確值得我國人民的感激欽佩。

本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他和當時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將軍在戰略上和對華政策上意見的不同。史迪威對中國政府的批評，頗爲苛刻，而陳納德是竭力支持中國政府的。事實上，他們兩位在對華問題上的意見懸殊，的確可以代表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方面的兩大派別，所以非常值得國人的注意。陳納德將軍在本書中把他的見解，敘述得很詳細，至於像史迪威將軍等人所持的相反見解，當然可以從其他著作中獲悉。孰是孰非，除了有賴於讀者作公允的判斷之外，今後世局的演變，是會給予適當的評價的。

中報館編譯室

# 陳納德著：論美國對華政策

## (一) 對華政策的失當

今日，中美兩國的六萬萬民衆，正受着十年來美國對華政策失當的直接影響。

除非發生美國能在最後一刻切實理解實際情形，對中國表現合理的同情並作積極的援助這種奇蹟，再加上中國能在最後一刻表現出勇敢沉着的奇蹟，不然，就祇有兩種不幸的變通辦法：或者是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災禍，或者是引起全世界向世界性的專制制度投降這種更大的災禍。

兩者之中，無論發生那一種，全世界的自由人民都將承受美國因循坐誤所造成的悲劇性遺產。我們美國人會爲了走錯了路，不得不爲維護我們的利益和自由而作戰，或者是不得不把我們的利益和自由可恥地委諸他人，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在這些論文中，我想把美國這種失當的情形透露出若干詳情。我想說出誰應該負這種處置失當的責任及其理由所在我將說明人名，日期和地方。我將透露的材料中之若干部份，至今還是秘密的，其中有許多被埋在陸軍部，國務院和白宮的檔案中。

其中有一部份讀起來是不大舒服的。就國家的立場言，我們不便承認我們會以不正大的方法對付一個信任我們的友好人民的國家。我們不便承認我們未能對一個盟國恪守諾言。

我們不便承認我們爲了要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而出賣掉中國的土地，而事前我們又沒有獲得中國的允准。要透露我們把中國最有價值的土地給予共產黨而對中國却未曾設法作任何補償，乃是一樁不舒服的事情。

我在一九三二年到中國，此後幾乎全部時間都在那裏過的。我組織並且領導了「飛虎隊」。我熟識遠東方面所有高級的美國司令長官，而在戰爭來臨之時，和他們一起服務。我以第十四航空隊指導長官的身份，深知美國對華政策的卑劣。在戰爭期間，我看到它運用的情形。現在，我在中國，正目擊這種政策在今日所產生的不幸後果。

在重慶那些黑暗時日中，我注意到蔣委員長把他團團被囚貧乏不堪的國家團結在一起，並且屢屢號召他衣衫襤褸的軍隊去抵抗日軍野蠻的進攻。

蔣委員長的作戰，乃是在極大不利情形之下英勇領導的一個最令人振奮的實例。

就在他作這種偉大的努力之際，若干美國盟友會屢刺其背。我說起這件事，就覺得可恥。

例如，在當時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在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面前攻訐蔣委員長的時候，我就在場。我將敘述這樁事情以及其他。

總而言之，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及若干美國在華官員的活動，並不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美國人民應該知道美國對華政策失當的背景，這一點非常重要。他們可能爲了這種失當的政策而以他們子孫的鮮血作爲代價。

他並不想替中央政府洗刷它在對美關係上所犯的罪過。中國政府已爲美國的批評家就許多事情提出過許多次責難。我不能再增添什麼。但是我所說的可能有助於將這種批評置於適當的地位，俾作適當的看法。

從一種狹義上講，中美關係的失敗我認爲目前的局勢就是這種失敗的明證——主要是由於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化難以獲得調和，因爲每一種文化都有它根深蒂固有時候不能容納其他文化的優點和缺點。

但是除了這種可以設想到的限制之外，還有着執行美國政策者種種不可寬恕的失敗，這種失敗，唯有在疏忽，偏見，短視，判斷不準確以及（我還得加上這一點，頗覺可恥）某種撥弄是非的傾向這種情形之下，始能發生。

在這些回憶中，我希望就過去十年中美國對華關係勾出一部份輪廓。我希望靠了這個辦法能够幫助其他美國人理解我們與中國國民政府友好合作方面所以困難衆多的背景。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必須答覆的，那就是：美國在以對日戰爭爲代價去維護中國門戶開放的傳統原則之後，怎樣可以容忍甚至幫助蘇聯共產勢力來代替在中國境內已被粉碎的日本帝國主義？

一部份的答覆存在於一個歷史的事實中，那就是我們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維護門戶開放主義，直到日本發動了對珍珠港的攻擊。這是在日本發動征服中國四年之後以及在在日本獲取滿洲十年之後。

這一簡單而嚴肅的史實，應該給予美國人一個教訓，就是想用低廉的代價和侵略者妥協，是永遠不可能的。

爲了要找尋我們對蘇聯共產黨在華勢力變幻無常的態度之其他原因，我們勢須去發掘美國人最近和爲大家所承認的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傀儡之間關係的若干方面。

這簡直是歷史家的工作。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是如此具有流動性，致使我們不能等待它冷凝以後再去研究它的本質。假如我們一定要等下一代的研究人員去拼湊這個悲哀的記錄，或許是失之過遲了。

最近十年來，我國對華政策之失當，始自一九三七年，亦即日本發動征服中國之後。日本這一行動，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對美國以及世界和平的重大利益相敵對的。我們沒有做什麼，或者幾乎沒有做什麼。

一九三一年日本在滿洲的作爲，今日在蘇聯支助中國共產黨方面看到了類似的情形。這毋需得證明，因爲事實上這些傀儡是由蘇軍自日本關東軍方面奪獲的武器加以武裝的，而蘇軍之侵入中國東北，係出諸美國在雅爾達所發出的邀請一九三七年，日本在中國的作爲，不久可能又有類似的事情發生——這一次不是蘇聯照日本的式樣侵入，而是經由東方共產黨的傀儡勢力。計劃是相同的，而且從軍略的含義上講，甚或比日本最後終歸失敗的「共榮圈」還要浩大。

## (二) 兩種相互呼應的特點

中國目前政治與軍事局勢，大部份是由美國官方鼓勵中國共黨和妨礙中國中央政府所促成。

在我們戰時與中國中央政府聯盟的四年中，這種現象到了中葉的時候，如同奇葩怒茁，而從此盛開甚久——我以為是太久了。

我們對武裝反叛家所承認的政府的鼓勵，以及我們對該政府的吹毛求疵運動，也是同樣奇突的遙相呼應，這種吹毛求疵運動，始於有益批評的錯誤，一方面，轉而降爲直率的誹謗。

我們政策上這兩種相互呼應的特點，很明白是符合了共黨同路人的意願，即使事實上這並不是他們在戰時重慶和其他地方活動的結果。



我們政策直接受到同路人的淆惑已至什麼程度，我現在不能說。我既然對結果比動機更爲關心，無論如何我認爲這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事實上，中美合作的破壞者所期望到的成功，已比他們本身能够達成的更大。滿足此一期望的美國官員，已做了同路人的工具。

我並不是說負責的美國官員故意的在重慶玩着共黨把戲，但是我的確指責他們已進了共黨的圈套，而且因爲這樣做，曾經中傷了我們與中國中央政府，在戰爭危急階段的合作，而幾乎要永遠中傷下去。

對於戰時與戰後美國政策與中共妥協和綏靖的傾向，我祇能這樣的寫——關於綏靖中國共黨這一目標，現在很愉快的由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予以否認，雖然這是最近才聽到的。

一方面在背後說中央政府的壞話，另一方面却拍着共黨的背，這種雙管齊下的玩意，符合了而且幫助促成一九四四年自由中國的政治危機。假使在那時候不是蔣委員長把史迪威將軍驅逐出去，這種危機幾乎必定終於摧毀了那時候的美共同努力。

我們現在逐一討論那時候美國政策的兩種情形——其一是美官方對戰時盟友不同情的奇觀，其二是我們與中國赤色者「公開談愛」的相互因素。

在魏德邁將軍於一九四四年接替史迪威將軍之前，美方與中國政府的參謀諮商，幾乎繼續是過度的壓力和恫嚇，事實上，這祇是象徵史迪威和他的幹部對一位中國領袖的過低的估計，而這位領袖，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已經抵抗日本四年之久。

那時候，我們對華軍事與外交關係的類似，是很明顯的，即使軍事的一方面並沒有那樣奇突，這一種的雷同，也是可以預料到的。在這部回憶錄中，就直接討論後者而言，我是比較的有準備。

美國領袖似乎不能在互相諒解，互相協助與互相尊敬的基礎上與中國人民相處。「一個中國士兵，假使給予適當的訓練，配備與供養，是能够打仗的」，——這種見解，說了又說，也就是史迪威及其部下對中國人民信心所能表達的最大的徵象。

這種於事無補的說法，蠱惑了許多美國戰地記者，而且好像把史迪威當做了中國的恩人。事實上，這種說法，已低估了中國的潛力，幾乎是一種誹謗。

好像是有計劃的策謀一樣，美國對中國中央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包括軍隊）的估計，在凡是美國人士集會的地方，都已成爲話柄。一方面，在其他地方的美國士兵都奉令避免談論中國政府，但在另一方面，在重慶的美軍官對於中國政府的實際或是莫須有的缺點，却絲毫不放鬆的背誦出來，而成了一種被核准的習慣。

即使所說的是事實，這些唸唸有詞，已經超過了普通任意說話的範圍，何況並不是事實，所以這已够說明他們不謹慎與毫無思慮的至深且距。

司令部人員與美國戰地記者的接觸頻繁，（大部份是非正式的）增加了這種大量生產的對華批評。不僅是美軍，而且連同記者在內，他們在中國都是中國政府的賓客，而這一政府却時常被抨擊，對於這一點，他們好像很少介意。

我的空軍司令部在昆明，但時常都到重慶的戰區司令部去。每一次赴渝，如果我要聽，我總是可以聽到這種運動的回聲。這不能被視爲一種竊竊私語運動——它是太過響亮了。

史迪威在重慶從不接見美國記者，但是他的不恭敬意見，總是在私人談話或是新聞會議中以「不得發表」的名目供給記者。從一位於一九四三年末到渝的記者那裏，我得到一個例子。他在「不得對外發表」的談話中，詢問史迪威，中國那時候最需要什么什麼去繼續作戰。

對於這一問題，史迪威簡單的答稱：「嚴密選擇一百個頭顱，把它們殺光」。

史迪威將軍對蔣委員長的低微估計，時常都表露出來。我想起其中最重的一個例子。

一九四三年春天，羅斯福總統在華府召開參謀聯席會議，我奉命出席，邱吉爾亦在場，羅斯福總統要求史迪威對中國局勢，作一概述。史起立猛烈抨擊蔣委員長，說委員長不可靠，不知感恩，不誠摯，而不忠實。羅斯福先生打斷了他的演說，問道：「陳納德，你對此有何感想？」我立起來告訴他們說：在我留華這許多年，委員長從未在任何方式下對我失信。我認爲他是一個偉人，也是能使中國團結的唯一領袖。」

這一次，史迪威將軍與我的評語，都在白宮筆錄之內。

### (三) 「餐桌前綫」在重慶

在我們戰時與中國同盟的大部份時期內，中美關係的慢性緊張化，已把重慶餐桌變成一奇突的宣傳戰綫。在這戰綫上，美國人頌揚中國共黨，而苛責中國中央政府。這種局勢，顯示我們戰時政策的重要錯誤和在幕後的思想。

此一錯誤的根源，在於若干美國人不願接受共黨本身以前的口號，那就是：「共產的目標以前曾經是而且將繼續是世界革命」，在戰時以及戰後，我們需要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我們是否幫助共產主義，抑或是支持一個效法我們純潔政治與社會理想的政府，直至最近，我們還是沒有決定。

但是除了這種悲慘的猶疑不決之外，我敢確定：我們在戰時官方的鼓勵中國共黨，乃是一種加諸中央政府的壓力，很不需要，它已近便的代替了美方在互尊及互解基礎上與重慶政府的往來。

這種壓力，也就是被正式承認的「恫嚇，央求，諫告，及虛張聲勢」等戰術。這些戰術，代表了我們與華方往來的標準程序。這是不需要的，關於此點，已由史迪威繼承者魏德邁將軍予以證明。

美方幫助共黨在重慶增強壓力，不啻玩火。中央政府，雖然在若干美國觀察家看來是這樣的薄弱，但是依然具有充份力量抵抗那種壓力，直至中美關係在魏德邁下改進為止，對於這點，我們是應該感恩的。

在中國的暗淡和破壞的戰時首都中，社交生活集中在宴會與鷄尾酒會，美國軍官把它們變成延安赤色宣傳以及批評中央政府的講座。

就是在史迪威指揮下的高級官員之間，對於這些事情，也很少謹慎從事。美國觀察家在延安所得到良好印象，無論是怎樣的迅速消逝也很普遍的傳播出去。「中共並非真正的共黨，他們祇是農民改革者」，這已成為當時的談話原理。重慶的「餐桌前綫」，已成為虛偽荒誕句語的集中地，深深的蠱惑了美國民衆，我對此決無懷疑。重慶有勢力的餐桌，一方面成為反蔣與親共的「戰場」；另一方面，美軍司令部與記者招待所也是這種宣傳的指揮與觀察站。美軍總部

與共黨總部都同時與記者招待所維持密切聯絡，或是記者招待所與他們維持聯絡。

中央政府與美軍當局雖然分別以主要及次要地位檢查拍出去的新聞電報，但也很難防阻疎漏或偏袒，而絕對不能防阻記者離華後的曲解。在重慶的美國檢查，祇限於保護美國的軍事秘密。

對於中共美麗的描述以及對於政府頑固腐敗與無能的黑暗故事，派在重慶的美國記者是最好的聽衆。

中外人仕同具史迪威部屬的輕易信心，其中很少政府方面的人物，而大多數是中共與同情中共的人物。

據美軍司令部人員告訴我的部下說：這種放蕩不羈的談話，曾經史迪威核准，據說這是以壓力加諸委員長的方法。我相信這是事實，但是如果不是，史迪威未能禁止這種行爲，其錯誤是同樣的巨大。

在重慶的這種談話，大大的加強了共黨，而減弱了政府的地位。這時候產生了一種觀念，那就是：在國共談判中，主要的要政府方面讓步。

假使果真有機會促使國共和好而阻止中共捲入國際共產主義的潮流，（我很懷疑曾經有這種機會），那種機會，已爲美方在華的行動所破壞。

#### （四）一九四四年的怪現象

假如美國的政策，對日戰爭期間達到了它在中國的顯著目標，則現在就沒有幫助中國以抵抗共產主義的問題了。中國將早已共產化了。

我並不是說這是我們在中國的有所爲而爲的目的，但是我誠懇地相信這將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

在我們對華軍事聯盟這三年中美國所實施的政策，其主要之點就是增加對中國中央政府的要求，而於一九四四年達到了最高峯，簡直有使這個政府讓位的意思。

同時，我國政策的執行者又不斷和中國叛亂和自治的共產黨進行着一種「公開的調情」，希望用美國武器來武裝他們，並且帶他們到國民政府中國地區來和日本人作戰，——而那時候，中國國軍司令毫不缺乏人力，却正在要求美國軍

器和藥彈。

並且有一個消息說，共產黨曾表示願意把共軍的直接指揮權交給我們的戰地司令史迪威將軍。這個消息，並不在我官方職務的範圍之內獲得，但是是可靠的。假如共產黨確已提供過這樣一個辦法，那麼我對於它的終極秘密目的毫無懷疑，那無非是要在國民政府中國地區攫取權力。

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在蔣委員長拒絕美國最後與最大的要求迫使美國召回史迪威之前的不幸情形。在近乎有三年的時間中，史迪威曾不斷堅決要求中國軍隊完全由美國軍官團管理，直到上校的階級。

據我所知所信，除了史迪威企圖經由緬甸打開一條陸上交通綫的強烈希望之外，這個設想欠佳的計劃，乃是史迪威及其屬員所發動的長期策劃的一個良好實例。

關於美國在華軍事策劃的失敗或者缺乏策劃，以及美國的要求所引起的危機，我們以後再會講到。目前，讓我們來考慮美國重慶司令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發生的所謂「公開調情」的現象。

一九四四年及其前所謂中國西北邊區共產黨「邊區」首都延安在重慶設立一個代表團，作為和抗日中央政府合作的一種表面掩飾。實際上，這個代表團除了是一個刺探消息機關和宣傳中心之外，極少其他意義。

直至對日勝利日之後，美國策劃者開始利用這個機關來進行以中國共產黨併入中央政府為目的的談判。其前，共產黨代表團的主要任務，似乎是新聞聯絡工作。報界對於「獨裁的」中央政府攻擊，其大部份材料係來自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團，這雖未公開發表過，但是是一個富有諷刺意味的註解。

除了這個離奇的辦法之外，美國的戰地參謀部後來又另外加上一個——那就是在延安成立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對於此一行動唯一可能的辯護，就是在一個本身顯然缺乏軍事情報的地區供給軍事情報。

但是美國駐延安代表團實不止以提供情報為限。它使共產黨便於獲悉我們的軍事措施，並使美國記者以及留駐我國在華戰地參謀部的國務院人員不時可以到延安去跑一趟，以宣揚共產黨的主張。

在重慶戰地司令部與延安之間，既有空中交通的便利，所以任何人要到共產黨這個展覽地區去旅行一次，是相當容

易找到一個適當的藉口的。已往中國政府一向不贊成這種非官方的接觸的，尤以新聞記者的接觸爲甚，可是那時候簡直極少辦法可以加以干涉了。

假如美國駐延安代表團的確是有價值情報的一個來源的話，這種情報實在缺少機密性。假如這種情報的機密性係屬需要的話，我覺得實際與需要之間存在一條鴻溝。

一個軍官向我報告說，他有一次到重慶記者招待所去的時候，獲悉共產黨相當「喜歡」史迪威來領導他們的軍隊。假如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話，對於如此微妙的事情竟不能保守機密一點，不免令人驚奇，其程度，初不下於這個情報本身。假如要辯證美國駐延安代表團的確提供情報上的便利的話，那麼史迪威的繼任人魏德邁認爲這一機關並不需要這一事實，乃是一個針鋒相對的反駁。我懷疑這個代表團的意義不止以更多的壓力加諸蔣委員長爲限，雖然該代表團及其協同培植起來的親共反蔣說素對於十足共產黨以協助與安慰一點，乃是不成問題的。

當時重慶流傳着一種戲言，就是美國司令部參謀部正在擬訂「一個私下的外交政策，由約翰·戴維斯（國務院派駐史迪威司令部的幕僚）作爲國務卿」。

一九四四年間，美國在重慶政策的另一不健全論調，見諸於有關美國大使館人員傑克·塞維斯以及其他人士的案件之種種流言，此輩人士曾被控以重要機密文件傳給共產黨同情者。塞維斯後來被宣告無罪。

但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史迪威參謀部的一個較低級人員，曾說過對塞維斯的控告，乃是在製造「第二陶爾麥斯事件」。他預料塞維斯的辯護就是在確立一種證據，就是他不過按照史迪威的政策對重慶政府實施「舊有的壓力」而已。

## （五）政策執行者史迪威

戰時美國對華政策主要執行者史迪威將軍，在他與中國中央政府相周旋的整個三年中，一直以美國的租借供應品作爲控制的手段。

他用租借作爲一種法寶，企圖最後能統治中國——但是結果失敗了。

史迪威在處理中美合作關係方面，缺乏友好的敬意和坦白。他幾乎一直和蔣委員長不相協調，似乎不把他和其他中國領袖作爲同事看待，而把他們當做要加以克服的障礙看待。威脅是他在勸誘他人時最熟練的方法。

史迪威及其僚屬或則施用壓力要求擴大在華的權力，或則在華盛頓方面不准其放手做去的時候，就批評華盛頓「柔弱無能」。官方的記錄顯示他會屢次要求華盛頓給予權力，俾以停止供應品作爲對付重慶的手段。他這種行動在中國方面早爲人所熟知。

根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在一九四四年被召回的種種情形，我相信他最後的威脅乃是除非他可以自由控制中國的作戰實力，不然一切對華援助將予停止，或者較此爲尤甚。——至於羅斯福總統是否支持這種主張，則不得而知。

雖然由種種不同理由，這個歷史性的哀的美敦書爲中美兩國政府所嚴守秘密，但是我對於它可能發生的影響却毫不懷疑——那就是由史迪威委員長來代替蔣委員長。

在史迪威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及蔣委員長參謀長的整個時期中，這是決定他行動的一個目標。所以，自從一九四二年間史迪威走出緬甸建議將中國軍隊置於美國軍官管理之下之日起，直至一九四四年被迫自重慶被召回的戲劇性攤牌爲止，這一日標控制着美國的對華關係。

截至那時候爲止，史迪威的作爲並無推薦他擔任這樁巨大任務的資格，而造成他提出這個重大要求的中國在軍事上的失利，其過失由於他自己的缺點和短視者，與由於中央政府者同樣多或者更其多。以後，我將分析其間的因果關係。

但是除了其他一切考慮之外，史迪威對蔣委員長的最後要求苟予准許，則我相信這將導致美國對華政策最黑暗的失敗，其結果，祇能造成一個國家的瓦解，而該國的友誼和實力，不論我們怎樣時常判斷錯誤，一向是並且依然是我們在東半球最大的資產。

我深知中國人的情緒和個性，確信不論是史迪威或者任何外國人，都不能統治他們，除非經由武力並且靠了中國傀儡的帮助。可是，猶如史迪威的繼任人魏德邁將軍不久之後很明白加以表現的，和中國政府相處另有一種合理而有效的方法，而史迪威却從沒有嘗試過。

在最近幾個月，美國又在堅持「改革」爲援助中國反抗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這使我不得不懷疑華盛頓是否已經回復到史迪威這種不可取辦法的精神。我們不是能够再度要求中央政府作實際上的退讓，作爲我國對華援助的代價？顯然的，在史迪威被召回很久之後，甚至在他逝世之後，他對中央政府的錯誤估計，對於我國戰後的對華政策，依然具有一種微妙的和引起偏見的影響。這不是不自然的，因爲史迪威對於中國的觀念，曾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左右華盛頓的態度。

我覺得史迪威任務失敗的真正原因，華盛頓方面從未正式加以承認，那就是：一個人被派去擔任一樁超過他能力和不合他個性的任務，猶如我想在這些回憶中加以指出的。

由於深恐人家以爲我在對一個已經無法爲自己辯護的人加以歧視之故，我應該說明早在史迪威逝世之前，我就會把這種批評置於他的面前。據我所知，這並未引起他的反應。

縱使是如此，假如我不能確定我這種公開講述其經過能辯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爲人誤解的幾章之一這個健全的目的，我是不願意這樣做的，而這一章，對於適切理解我國的對華關係，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 (六) 史迪威引起的磨擦

一九四四年，在中美戰時聯盟到達最低潮的時候，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考慮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撤離中國。究竟他會否向美國陸軍部提出過正式的建議，還是他不過運用它作爲史迪威對軍慶最後威脅之一，我不預備說。祇有戰區的檔案或者在一九四四年史迪威被召回前參與其最後談判的人物之證言，可以充份透露其詳情。

在我看來，這是史迪威爲擴大其在華權力，於採取種種步驟時根本不顧其可能影響的一個著例。鑒於當時中國的情形正在惡化之中，這種行動，甚至以這種行動相威脅，勢將引起完全混亂，假如這種威脅爲大眾所知的話。

在那時候，第十四航空隊乃是在華獲得大眾信任的唯一有效軍事力量。

不管這種辦法怎樣激烈，當時的確想促使中國當局注意及此的。我第一次獲悉這個消息，乃是中國人向我私下詢問



的時候，他們希望知道這個計劃是否將被實施。戰區司令部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供給我任何消息。

現在回想起來，我想到當時第十四航空隊被派飛越駝峯空運貨物的噸位銳減，交給中國機關的貨物也大見減少。在我猜想起來，這種減少乃是史迪威除真正撤退空軍之外，對重慶實施壓力的另一辦法。

一九四三年秋季，也就是史迪威最後被召回的一年之前，戰區司令和蔣主席之間發生了一種磨擦，其嚴重程度幾乎和其後迫使史迪威離開中國的情形相仿。事實上，幾乎要求把他免職。

當時史迪威曾經由蔣夫人保證蔣委員長，就是他以後將聽從蔣委員長的意見和訓令。我曾目擊一部情形。這個保證似乎是在經過一番談話之後提出的。

我在離開這次集會的時候，蔣夫人的姊姊孔夫人把我拉到一旁，並且使我相當感到離奇地告訴我說：「史迪威將軍已經允許服從蔣委員長了。」

一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瞭這個離奇的保證之來源，但我確信縱使史迪威想和蔣委員長保持最好的關係，可是作為美軍戰區司令的他，未能在各方使他自己符合他的意志。

所以我假定他提出這個諾言，並無加以恪守的意思。應該加以指出的一點，乃是他們關於緬甸戰役最激烈的爭執，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之後，立即開始發生。

根據我和中央政府相處的經驗，我發覺友好的坦白，乃是滿意解決相互問題的唯一先決條件。對於蔣委員長，我從未發覺有將真相加以隱瞞的必要，不管真相是怎樣不愉快。我一向把我所看到的事實，實事求是地告訴他，假如局勢需要採取校正措置的話，這種措置就會來的。

不用說，在提出批評性的報告之時，對於作為中國最具有最決定性的人物之蔣委員長的地位，應該予以適當的尊重——但是不必諷頭。換言之，友好和有效的聯繫，祇需要一種對任何國家首長應有的自敬敬人的態度就可以了，假如這些國家的友誼和幫助是我們所重視的話。

史迪威在他整個留華期間損害了中美關係，而他辱罵的程度，在華盛頓決定將他召回之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或許

達到了最高峯。史迪威的說話當然是「不予發表」的，但是猶如許多「不予發表」的說話一樣，後來常常會被刊印出來。刊載這件事的一本「新聞週刊」我沒有保留起來，所以祇有靠記憶了。

在我回想起來，史迪威將軍在離開重慶時對蔣委員長所作的評價，乃是一種「欺人之談」。

### (七) 我與史迪威的關係

假如我能設法加以分析的話，我和史迪威將軍三年的爭執，由於個性上的衝突者不若由於方法上的衝突來得多。他和中國中央政府的爭執，則兩者兼而有之。

我知道史迪威將軍在他屬員的通知之下，以爲我使中國人反對他。這是不足爲奇的。要一個上級長官相信他之不爲人家所愛好乃是由於他自己，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確信他和中國領袖相處的態度和方法，乃是他的失敗以及中美戰時合作關係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間失調的主要因素。

從一開始起，史迪威將軍，從來不大隱瞞對於我以及對於和他相處的中國領袖們的不喜，因此要我像一個朋友一般地對待他，也就不容易了。

我對於中日戰爭比任何其他美國人具有更長和更親切的實際認識，但是對於處理對華軍事關係的任何重要的問題，史迪威將軍從來沒有徵詢過我的意見。當我提出意見的時候，又往往輕蔑地被回絕。

雖然我是他的高級空軍軍官兼蔣委員長的空軍參謀長，却從沒有被召到戰區司令部去就我們的空中局勢陳述意見，直至一九四四年間魏德邁接替史迪威之後。

我對於在政策方面和史迪威時常意見不一這一點，並不覺得可恥，但是對於他給我的每一個命令，我總忠實地予以執行。我並不爭辯我一直是對的，史迪威一直是錯的。在我的指導之下，的確犯過錯誤，但是我相信這些錯誤，大部份是手續上的而非判斷上的。

我們的意見不一，從沒有到公開破裂的程度，這是我們兩人各知分寸的一種成功。猶如以後的事實所證明的，史迪威的失敗，完全是由於他對中國人的關係以及他對處理對日戰爭的錯誤軍略抉擇。

在他被召回之前很久，史迪威將軍一直禁止我舉行記者招待會，雖然我是第十四航空隊的司令官，司令部設於昆明。重慶戰區司令部認為唯有戰區司令可以在記者招待會上會晤新聞記者，雖然事實上，在大部分戰爭期間中，第十四航空隊乃是美國在華唯一的作戰部隊，因此對於美國大眾是具有極大興趣的。

戰區司令部的規定以及戰地特派員相反的堅決要求，迫使我採取了一種可笑的變通辦法，就是「集體接見新聞記者」，而不是舉行記者招待會。唯一的不同之點，就是特派員在所發的消息中不說「記者招待會」而說「會晤」。這絲毫的區別似乎使一切有關的人都感覺滿意，包括戰區司令在內。

在二九四五年間，當我擔任空軍司令任務將告結束之時，有一點成爲很明顯，那就是縱使史迪威離開中國已將一年，他對我的判斷在華盛頓方面依然很有力量，於我不利。在我擔任司令期間，我一直是負責官員隨便流傳的惡意謠言和雜談的目標。我恐怕高級方面一定很相信，而並未顧到事實真相。

在一九四五年，我被人指責未能與史迪威將軍合作，但是使美國在華所作努力未致完全一蹶不振者，却正是史迪威有時認爲是危險而討厭的第十四航空隊，猶如我將在這些回憶中加以指出的。

一九四五年間在中國方面的空戰獲勝而離確認此種成就尚遠之時，華盛頓在重慶成立了一個高級空軍司令部。或許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實際上，我認爲此一行動係對我而發。

我於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因爲我是被邀來創辦中國空軍的。我一直留在中國，因爲我想幫助中國擊敗日本，那時離開珍珠港事變尚有四年。

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我恢復服役美國陸軍，因爲我相信有更大的工作應該要做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對美國與中國在戰爭上的效用已告完畢，所以我再度從美國陸軍中退休。我在退休之時心中一無若于失望，但是依然堅決相信史迪威是一個優秀的戰地司令——美國所曾產生過的最好的師長之一。

## (八) 缺乏廣大深刻眼光

中國在美國聰明與友好的幫助之下，縱使在我們正和她並肩對日作戰的時候，也可能踏上戰後堅強穩定和自行改進之路。

但是，這個機會在疏忽和拙笨的手指之間溜走了。世界軍略重心的亞洲之半，最後變成了地位和勢力的角逐之場，而且自從我們擊敗日本之後，我們不斷在退縮，蘇聯不斷在佔優勢。

在一九四二年甚至還遲些，中國的情形是極適宜於我們作長期的投資，以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投資的數額可能是小的，並且無論如何不會比我們就是沒有這種很好的收穫的希望而也應該作的投資來得多。除了物質援助之外，所需的投資不過是在觀念上和一個盟國發展光榮的關係，而這個盟國之傾向我們，早已非常顯明的了。

可是這雖然是更容易和更有利的途徑，但是要發覺它並且遵循它，却需相當廣大和深刻的眼光，而我國推行對華政策者却是盲目的。

在幫助中國作戰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我們斡旋的力量來促進中國政府自行改進，而不必設法把她的政府分裂開來，可以誘使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必要的改革而不必設法來接管它們的指揮權，可以培植中國共產黨員的和平轉變而不必去增強他們的要求和擴大他們的野心。在每一方面，我們都走錯了路，放棄了第一個辦法而贊成第二個辦法。或者當我們嘗試第一個辦法的時候，我們同時又嘗試第二個辦法，致使我們的努力，徒勞無功。

自從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進攻以來，中國變成愈來愈依賴美國的援助。自從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她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國的幫助之上，而她的軍事命運也和我們併在一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存在着我們最大的機會在日本發動征服中國之前，年輕的中華民國共和國雖曾大踏步向前進展，可是在國民黨之內，還有一種反抗西方思想與政府以及公共福利觀念的勢力。

我們在華的勢力假如予以準確的運用，就可以減小國民黨反動份子的力量，而可以促進黨內更自由份子的地位。這

個步驟，在本質上很簡單的。中央政府中有一種自然的傾向，就是把它對美的關係托付予講我們的語言的這種人，無論是在實際上或者在比喻上講。這使在國外求過學一般地說是進步的贊成中國文化現代化和自由化的中國人抬頭。我們祇要能够運用我們對中國人的關係上這種已經存在的有利之點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我們在對待中國人時，必須以平等與互信爲基礎。假如美國人以猜疑與不同身份來對待對方的中國人。那就不能發生作用。甚至在較低級方面相處得不錯而在高級方面缺乏友善之意的情形之下，也不能有良好的結果。

負責我們軍事外交政策的美國人，照例可以選擇一條康莊大道，就是經由中國自蔣主席以下的自由進步份子而建立一種有利而持久的美國勢力，但是他們却採取猜疑和自命不凡的小路。有時候我們的官方態度，猶如戰區司令部所表現的，簡直接近侮辱和公開的仇視——不但對自由份子是如此，就是對整個重慶政府也是一樣。

假如經由我們的鼓勵進步份子，能够表示他們可以來處理對美關係，那麼他們可能在整個國民黨中佔有顯要地位。因此中央政府和中國將見加強，很可能——雖然不一定——中國共產黨可能會離開他們馬克思主義領袖，而在蘇聯可以用中國的共產黨作爲她戰後擴張的爪牙以前，全國已經團結了。

無論如何，靠增強中國政府的辦法來增強中國，可以阻抑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重大企圖。

這種說理大部份是屬於「可能是如此」的一類之內，但我相信它顯示出戰時我國援華政策在運用上的缺乏理想。

## (九) 決心要打回緬甸去

嚴格地講，作爲我們戰時對華聯盟主要機構的中緬印司令部，在史迪威將軍指導之下，從沒有爲中國做過任何軍事上的設計。

我確信戰區司令部在史迪威任職期間的檔案，將沒有任何軍事計劃可以透露，除了橫斷緬甸的攻勢，或者是戰區司令部從我十四航空隊司令那裏接到的空中作戰計劃之外。假如還有其他的計劃的話，至少我的司令部沒有得到。

假如真的想要計劃過的話，那也一定是屬於極抽象性質的，因為戰區司令部缺乏對於適當的設計所必要的軍事情報。假如沒有可靠的情報，够得上稱爲設計的東西，是不能想像的。

戰區司令部從來不依靠中國方面的情報，後者是既不準確，又在作戰的價值上講往往太慢。但是在另一方面，戰區司令部又並不設法組織自己的情報工作，並且在某一個時期，的確曾經禁止過我爲第十四航空隊去做這種工作。

戰區司令部人員曾經堅持常德方面的攻勢「祇是一個搶米的襲擊」，雖然戰區司令部在當地並無觀察員，而和我自己的空中地上聯絡官的證言相反，其中有兩個聯絡官曾經和中國軍隊一同經歷常德的圍困。他們稱呼這一戰役爲有限度的攻勢。

爲了維持空中的作戰，我不得不迫使戰區司令部給予我權力，以成立我自己的情報系統，這個系統，在史迪威被召回的時候，乃是美國在華唯一有效的情報機構。

常德之戰幾月之後，當重慶司令部成立一個新的情報機關的時候，他已經認識一個情報網的必要，而曾經在常德工作過的我的空軍觀察員，成功了它的核心。後來，杜諾文將軍的軍略作戰局願意提供人員和配備來加強我們的新機構，但是爲了某某種種理由，始終沒有實現，其中我知道包括史迪威將軍的反對在內。

戰區司令部不但沒有替中國設計，而且也沒有設計的準備。緬甸作戰似乎被認爲本身就是目的所在。史迪威頗有意於完全置中國於不顧。

他的確反對在中國境內在空戰方面作切實的努力，其理由是這種努力將刺激日本人。我完全不懂他爲什麼對日本人在中國方面的反應是如此關切，而對日本人在緬甸方面的反應却毫不想到。

我一直明白贊成儘量擴充飛越駝峯的工作，一則是爲了想建立一個規模雖小而有效的空軍，二則是爲了要增強中國的地上部隊。我相信攻勢作戰是使日軍失却平衡的唯一方法，以待中國的軍隊成爲相當堅強。在好許多月份中，空軍乃是中國方面唯一可以支持攻勢的武器。

在中美合作期間，主要的軍事問題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怎樣把我們聯合的潛在力量，在對我們最有利的地區，打擊

敵人。對於解決這個基本問題，史迪威將軍極少貢獻或者毫無貢獻。

對於他所以也就是對於在這個戰區美方的整個努力，完全為一個目標所控制，那就是從一九四二年起，史迪威決心要打回緬甸去，因為在一九四二年中日侵攻緬甸之時，他曾指揮中國遠征軍而遭敗北。

有時候，史迪威可能誠懇地感覺到在緬甸方面進行攻勢以謀為中國在陸上打開一條通路，乃是中國困難處境的一個合理解決辦法，但是我當時相信現在還是相信他的判斷是為他想打回緬甸去的計劃所左右。

稍為把問題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就是由於地形與距離的關係，陸上的一條通路至多祇能使少數用卡車載運的供應品運抵中國西南部的終點，而幾乎同樣重大的在中國內部運送分配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對於後一問題的有效解決，在史迪威指揮之下的戰區司令部，並未作任何貢獻。

的確，經由緬甸公路實際上用卡車載到中國來的幾千噸貨物，以與三年史迪威將軍在該方面所費去的時間，生命和物力相較，不能算是所得已償所失。

再者，假如把卡車本身的重量減去，緬甸公路所實際載運的貨物噸數，為數並不可觀，而且單使卡車一面開到中國來而不開回去，也是不切實際的。的確，中國需要車輛，但是她本身的資源至多不過能够維持一萬二千輛至一萬五千輛車輛，非要等開放一個港口之後，才可以增加其維持車輛行駛的能力。但是在港口開放之後，車輛當然可以從海上輸入。

但是史迪威並未為中國擬具一個卡車計劃，也沒有考慮到在中國所需的卡車已經足夠之後，設法擬定一個在緬甸公路上卡車對開的計劃。有一點是頗有諷刺意味的，乃是第一批也就是最大一批配給緬甸公路的車輛，是五千輛道奇卡車，由美國國外經濟管理所派定，而史迪威和陸軍部對此均表反對。在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時，中國所能容納的車輛已達飽和點。戰區司令部在史迪威的繼任人魏德邁主持之下，已經認為緬甸公路上卡車一面開的辦法，是不切實際的，而史迪威及其屬員却一開始就主張如此做的。

所以對於緬甸作戰的唯一辯護，就是沿緬甸公路建設了一條輸油管，後者曾在幾個月的時間中把燃料輸往中國西南

部。

## (十) 緬甸輸油管的計劃

中緬印戰區司令部目光之短促，可由其對縱貫緬甸的輸油管的態度見之。

爲史迪威辯護者似乎理直氣壯，認爲不講別的，單是這條輸油管，就足以證明他一心一意致力於緬甸戰役的意義。實際上，輸油管計劃是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所設想的，後者係於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幾個月在美國成立，曾有一次爲史迪威所拒絕。

一九四一年夏季，在日軍佔領緬甸之前，殼牌油公司的工程師曾經設計一種可以隨時攜帶的輸油管，主張沿舊緬甸公路敷設。這種設計，曾送呈華盛頓的陸軍工程師，後者曾加以應用，但是當時並未用於緬甸。日軍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完全控制了那裏。

在一九四二年年底以前，戰區司令部人員並未考慮過輸油管計劃。在一九四二年年底時，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和租借代表向在重慶的史迪威梯形先頭部隊司令漢恩將軍提起這個計劃。他們建議將它包括於當時史迪威正在草擬的緬甸作戰計劃之內。他們提出了正式的建議。

當這個計劃向史迪威提出之時，他不表贊同。有人告訴我，當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後來想加以說項的時候，他拒絕討論此一問題。

據說史迪威的反應是這樣的：「我不要什麼討厭的輸油管——我所要的是子彈，祇是子彈」。

我相信輸油管計劃之最後併入緬甸作戰計劃，乃由於華盛頓方面的供應主任沙曼凡爾將軍的堅持所致。這是一個重要的計劃。假如沒有這個計劃的話，緬甸公路對於中國的價值，將不及增加一批飛越駝峯的運輸機。

我一向認爲戰區司令部第一應該注意的，就是儘量擴充飛越駝峯的空運設施。縱使在緬甸公路和輸油管都發揮作用之後，我們大部份所獲得的東西，還是從空中來的。



但是史迪威認為飛越駝峯的空運，乃是對他緬甸公路計劃的一種競爭。直到他緬甸作戰的中間階段，空運供應品的工作，對於他作戰的成功，成爲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假如沒有空運，包括油管的空運在內，輸油管工程以及緬甸作戰的其他方面，包括中國軍隊渡過怒江發動攻勢在內，都會在中途失敗。

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當史迪威在緬甸北部推進而把新陸上通路萊多公路建築起來之後，結果證明不能滿足他攻勢的需要，雖則開闢這條公路的表面理由，就是把貨物運到中國來。

起初，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美國飛越駝峯的空運工作，不爲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方面所重視。負責方面對於中國境內空運工作的重要性，未能明白認識。

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的官員在一九四二年時，想增加空運的貨物噸位，比賽爾將軍代表史迪威對他們說，他估計假如每月要運五千噸貨物，就需要在昆明區有廿五個大飛機場和三百架飛機。一九四五年，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每月飛越駝峯所載運的貨物，顯示這種估計的脆弱。

但是比賽爾的保守態度，照他自己的經驗講，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他之前以及在空運指揮部於一九四二年加以接管之前，在戰區司令部中負責飛越駝峯空運工作的奈頓將軍的保守態度，也是一樣。

在那一年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越駝峯空運工作，已經超過美國陸運飛機頗多。史迪威已同意將美國陸軍運輸機從一百架減至廿五架，猶如空軍司令部所命令的，其理由是駝峯這條路不切實用。當駝峯空運工作移交予空運指揮部的時候，會爲戰區司令部方面所反對而無效。

在駝峯運輸工作移交之後的幾個月之內，每月的運輸量是在一千二百噸與二千五百噸之間，直到一九四三年的夏季一直如此。史迪威將軍似乎並不感覺不滿意。

但是我是不滿意的。駝峯的運輸工作，直接有礙我爲中國空軍之隊以及後來的第十四航空隊成爲一個有效武器所作的一切努力。我被迫相信史迪威對於中國方面的空運工作，祇不過想每個月運幾百噸的炸彈，彈藥，燃料和零件而已。

就是我想保持中國空軍最低限度實力的這種努力，也使我於一九四三年一月間與史迪威及比賽爾有所爭執。那時候

，每月供給中國空軍大隊的燃料和汽油是七百五十噸左右，史迪威却還把它減少一半。

慎重研究的結果，顯示如此做去，中國空軍大隊勢必不但要放棄攻勢，並且要放棄中國各地的空中防衛，惟中國空軍大隊司令部及駝峯空運路線的主要終點昆明除外。同時，從駝峯方面運來的相當多的貨物，正堆積在昆明之西的雲南驛，且在緬甸與印度支那方面的日本飛機的轟炸範圍之內。

當我告訴比賽爾將軍說減少供應將使我祇能防衛昆明一地之後，他就回答說，我必須防衛雲南驛。我祇能回答他說，我不知道沒有燃料怎樣叫飛機起飛。

於是我飛到重慶去親自向史迪威解釋。他在口頭上命令我停止雲南驛的防衛。我要求他筆之於書，他並不這樣做。但是下一天早晨，他又把命令翻過來，把原已削減的貨物噸位恢復了。

## (十一) 改進內陸運輸問題

當史迪威將軍想從他的北緬作戰中爲他個人找尋辯護，以及爲中國的疾疫找尋萬應藥的時候，他的重慶司令部完全忽視了中國內部的運輸問題。

中國內部的局勢是如此，就是縱使緬甸公路暢通了，可能依然一無效果。戰區司令部三年來一直在想從緬甸關一條通路到中國來，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運輸，却未能注意及之或者拒絕注意及之。

當戰區司令部專心於經由緬甸開闢一條通路的時候，它對於改進中國內陸運輸却一無作爲，對於便利分配飛機駝峯而來日益增多的供應品，以及對於卡車運輸的準備，都未注意，雖然卡車運輸是戰區司令部所熱烈期待的。

一九四四年當日本的攻勢突入中國東部之時，中國軍隊不能獲得陸上的供應，雖然戰區司令部是想給予這種供應的。戰區司令部對於中國內部分路運輸的容易引爲滿意，可由一點見之，即在一九四二年時公路運輸幾不存在，供應處在那年年底僱用了一個民間工作人員泰勒來解決那個問題。

泰勒幾無任何協助，而須處理一樁其嚴重性不次於世界上其他工作的任務，他的失敗是注定了的。

一九四三年間，運輸方面會獲若干進展，但是此乃戰區司令部以外人員努力的結果。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和租借代表幫助泰勒，替中國機關所使用的卡車覓致零件，這些卡車在中國不堪應用的公路上担任大部份的載運工作。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的二個民間工作人員替泰勒完成了第一個完全的公路調查，後者後來成爲戰區司令部的一個基本指導。

當中國國防供應委員會的一個代表交出這個研究的時候，中緬印戰區的運輸主任頗表欣賞，但是在未看報告之前，先說他希望知道中國內部的運輸問題，是鐵路問題還是公路問題。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國內部的運輸情形是如此令人震驚，結果我就飛到中緬印後防司令部所在地的印度新德里，並要求由空中服務司令部負責此項工作。我並不想自己來管理此事，但是我不知道用其他方法來使供應處指派有資格處理此項重大工作的人員。

結果，在二月間，希漢上校被派到中國來。鑒於其沒有充份人員，缺乏供應以及在他權力範圍之外的其他因素，希漢可以說頗有成就。但是當史迪威將軍於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即緬甸公路開放的幾個月前被召返國時，仍舊沒有獲得完全的解決。

希漢爲一運輸專家，担任供應處中國區的運輸主任。他把從雲南省到中國東部航空基地的主要交通綫的運輸量，從每月二千五百噸左右增至六千噸以上，雖然戰區司令部方面會造成種種障礙。

從一九四三年年底起，人家會屢次對史迪威講，就是中國人如不獲得物質援助，就不能有適當的運輸。事實上祇有兩種辦法，或則是把新卡車從空中運到中國來，或則在雲南省以東實行空運。

但是在在一九四四年中，當史迪威承認第十四航空隊應獲得供應品俾能抵抗當時日軍在中國東部發動的攻勢之時，他把運輸責任交給中國政府辦理，而不願聽取相反的意見。

戰區司令部在中國方面的失敗，係與其對緬甸公路的估計相關。對於這個重大計劃的估計，戰區司令部方面一開始就是很膚淺的。

當緬甸公路問題予以充份考慮之時，運輸專家希漢上校對我說，爲了給羅斯福與邱吉爾參考，他估計緬甸公路的運

輸量每月決不能超過三萬噸。他是出席過第一次魁貝克會議的，結果證明這一數字還是太高。

可是在魁貝克會議中，對緬甸公路却產生了一個甚至更高的官方估計。這是把希漢所提出表面上是保守的二萬五千噸至三萬噸的估計，和另一個人隨便提出的十萬噸的數字折衷而得的。

史迪威對於增加飛越駝峯空運工作並不發生興趣，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季之後。那時候，華盛頓的聯合參謀部准許我的空軍首先注意每月由駝峯運入貨物四、七百萬噸。

後來有一點成爲很明顯，就是唯有在第十四航空隊達到了每月運載四千七百噸的水準之後，怒江作戰始成爲可能。史迪威對於飛越駝峯的運輸工作，態度已稍有轉變。

但是我對於執行怒江作戰計劃的故事，暫時不講，留待在下一章中敘述。這是一個令人遺憾而至今還沒有人講過的故事。

## (十二) 緬甸作戰的不協調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華盛頓會議中，我第一次獲悉史迪威將軍，英國方面和中國方面對於緬甸作戰策略的奇怪的不協調。

我以在華美國空軍司令的身份從中國飛返本國，傳向聯合參謀會議提出，我可以提供的意見——就在這次會議中，史迪威曾攻擊蔣委員長，猶如我在這些回憶中已經敘述過的。

蔣委員長並不在場，但是當時中國方面曾闡明立場，對於緬甸作戰完全贊成，可是堅持一點，就是假如英方不在緬甸南部登陸，那就無法進行。英方同意假如沒有南方的登陸作戰，緬甸作戰是冒險的，但是却力說他們沒有登陸的能力。史迪威將軍則堅持一個有限度的中美英攻勢，縱使沒有英方的登陸作戰，也得進行。

這些見解從沒有獲得協調，而作爲中緬印戰區盟國作戰努力主要因素的緬甸作戰，乃是一種強迫的妥協。結果，在英方對下緬甸的登陸作戰不存在的情形之下，中國的參加乃出諸脅迫。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怒江攻勢剛剛一個月之前，緬甸攻勢的中國部份已經從印度方面開始，可是戰區司令部却決定一點，就是因為蔣委員長「拒絕全力作戰之故」，四月份撥給中國機關的貨物噸位，將轉給第十四航空隊。

顯然的，這是迫使中國軍隊強渡怒江的最後壓力。

一九四三年二月，史迪威對蔣委員長施用重大壓力，主張加緊採取攻勢。可是在那時候，蘭姆加師團（在印度蘭姆加訓練的中國師團）和怒江方面部隊尚未準備就緒，而飛越駝峯的空運貨物，祇有二千噸左右來支持怒江部隊。

在一九四三年間，當史迪威第一次要怒江部隊作戰的時候，它們在武器甚至衣服方面的貧乏情形，是大家知道的，而在一九四四年真正的攻勢發動之時，情形也不見得改善多少。這些人在攻勢中竟能渡過怒江和越過高黎貢山脈，對於中國普通士兵的勇敢和堅忍是一種讚美——這些穿草鞋的兵士。

的確蔣委員長曾經答應怒江部隊將參與上緬甸作戰，但是這個義務必須和另一個諾言聯繫在一起，那就是英方必須協同在下緬甸發動登陸攻勢。

蔣委員長認為假如在緬甸南部不發動登陸作戰來破壞日軍的後方以及斷絕其交通綫，緬甸作戰對於他自己薄弱的兵力乃是一種不上算的投資。

對於這一點，我相信蔣委員長是有充份理由的，所以因為他在這方面不很熱心而引起人家對他缺乏信心的指責，我永不能加以接受。在我看來，英方的放棄海上登陸作戰已可使蔣委員長不必受這種三方面的約束了。

在五月間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中，中國方面這種理論方式是很清楚，而早在二月間即蔣主席根據當時情形而拒絕發動怒江攻勢之時，即已提出。我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會議中以及開羅會議以後，中國還是力持同樣的論據，雖然羅斯福，邱吉爾，蔣委員長曾就緬甸戰略獲致一種表面上的協議。

所以我的印象是如此：就是蔣委員長對於我認為是健全的戰略思想從沒有動搖過，直到施用最後壓力之後，那就是說除非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否則將斷絕一切對華供應。

在這裏，是值得把一九四二——三年中國方面的軍事局勢作一總結。

中國政府軍掌握着中國的內地，包括和緬甸接壤的西南以及華北，華中和華北相當大的地區，惟沿海和長江流域爲例外——在長江流域方面，日軍推進到漢口以上的宜昌。

中國的一切外來供應都被切斷，除了從印度方面由空中經由日軍所佔有的多山的緬甸北部——所謂駝峯——運來的一些供應。

這種局勢幾乎在一種停滯狀態中，祇受三種重要措置的影響而稍爲有一些改變：

①從緬甸撤退或者由空運到印度去的中國軍隊開始在蘭姆加受訓這些部隊會同曼里爾的突擊部隊在史迪威指揮之下於一九四三年十月經上緬甸發動攻勢。

②在中國西南部，組織了所謂Y部隊，其目的是在訓練和供應中國的遠征軍，後者是預備配合緬甸東部的攻勢以及英方在下緬甸的登陸作戰，強渡怒江向西深入緬甸的。

③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華盛頓舉行的聯合參謀會議改變了史迪威將軍的主張，給予飛越駝峯的空運工作以優先待遇，藉以在一個有限度而有效的基礎上，支持第十四航空隊。

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把能力集中於實現前面兩項措置，而第三項措置則爲史迪威幾乎一直置之不顧，因此在華美國空軍人員一直在爲供應問題掙扎。

### (十三) 怒江作戰利害參半

美國對於中國怒江作戰的供應設計，乃是一種悽慘的失敗。該項作戰，係由史迪威將軍的壓力而於一九四四年促成的。

這次作戰的記錄，似乎證實蔣委員長不大願意參加緬甸作戰的這一添出來的部份，是具有理由的，因爲當時英方已經取消對下緬甸登陸作戰的義務了。

在一九四二——三年的冬季中，史迪威曾經估計過怒江遠征軍每月如獲二千噸的空運貨物就可以作戰了，可是幾個

月之後在華盛頓的戰略會議中他却估計怒江部隊需要堆存貨物一萬噸。但是在最後計算起來縱使是這個數字也顯得非常之保守的。

雖然在中國軍隊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強渡怒江之前，負責訓練和配備遠征軍的美國Y部隊已經存在一年以上，可是該項組織却未完成有效的供應計劃。

在遠征軍實際開始作戰的大約兩星期之前，沿怒江的陸上供應計劃終被放棄而改取空中補給計劃了。如此，使飛越駝峯的空運工作，分散得更厲害，結果中國從駝峯而來的貨物，每月減少了一千噸以上。

怒江供應計劃的失敗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Y部隊的司令杜恩將軍的一個代表曾經和我商量，問我把駝峯方面的供應品由空中運赴怒江前綫附近地區，是否可取。

他解釋說，供應品是堆存在雲南驛，而Y部隊却缺乏公路運輸工具把供應品向西運出。他還說Y部隊的計劃需要性容約七萬噸把供應品從卡車附近運到作戰地帶去，但是所獲得的牲畜不及三千頭。

除了卡車的實際缺乏之外，供應問題並因對於少數的卡車沒有適當的加油設備而成爲更繁雜。因此每一個月，必須從昆明空運五百至一千噸火酒到雲南驛。這種火酒是中國製造的，用以代替較好的燃料。

值得指出的一點，就是燃料突然從昆明區向西移動，實際上幾乎使通往中國東南部空軍基地的本來已經不充份的卡車活動，完全陷於停頓。

雖然屢屢抗議，可是Y部隊對於卡車燃料所享有的優先權，繼續使向東的供應行動削減，致使在日軍的攻勢之前却不把空中作戰大事減少，並且在衡陽之戰到達高潮之時，迫使第十四航空隊把轟炸機撤退到後方基地。

由於運輸的牲畜不能應需要而獲得，致使在山中和怒江彼岸的中國軍隊惟有靠空中投擲的方法獲得食物，槍械和藥彈。在我看來，這種情形顯然爲地上部隊長官的一種錯誤觀念所造成，他們以爲中國人在「囤積」卡車和牲畜。

杜恩始終以爲中國人故意掌握住這些工具不放。他甚至指責中國人把卡車藏起來以供戰後之用，雖然把卡車藏藏着在整個戰爭期間不用而到以後還是可以應用這一點，是難以設想的。

此外，謹慎的考查並未發現任何被匿藏的卡車，而雲南省當局所說假如提供了所需的七萬頭牲畜的半數就足以使全省不能耕作而陷於饑荒的說法，也沒有方法可以駁倒。

在戰爭期間，批評中國的人把囤積的故事講得如此極端，簡直到可笑的程度。當中國東南部由於美國主張集中力量於緬甸而於一九四四年而告失却之時，桂林警備司令部僅因存有輕礮彈二千發而遭指為囤積。

事實上，我們可以對桂林警備司令部最兇的責難，乃是這一點「囤積」，在桂遭遇到日軍進攻的時候，實在太少了

#### (十四) 忽視中國內部局勢

美國戰時對華援助的大部份，是用緬甸周圍的作戰，而中國國內的局勢，却惡化到接近災殃。

我手頭沒有統計，可以顯示出在緬甸作戰期間美國所作努力的分配情形，但是我估計中緬印戰區全部能力的大約百分之九十，是用在這方面的。

從一開始起，史迪威將軍和他戰區司令部的人員，簡直完全忽視擴充駝峯空運的可能和需要，惟以有關緬甸作戰者為例外。對於緬甸作戰的特別注意，可由一點見之，那就是他把原來派到印度去改善飛機場以謀增進自上緬甸飛越希馬拉耶山脈空運的八個航空工程團，改用以建築萊多公路。

我們的戰略——那就是說史迪威將軍的戰略——把中國境內的軍事努力，限於據守的行動，而在一九四四年中，就是據守也談不到了。

中國不惟未能對戰勝日本在攻勢上有所貢獻，甚至在一九四四年時接近完全崩潰的情形，當時日本的攻勢掠取了中國的東部，而使開放一個中國港口以與太平洋方面美軍取得協調的可能性，減少到不能計算的程度。

緬甸作戰首先恢復了一條漫長，艱難而其價值又頗成問題的卡車通路，並且敷設了一條輸油管到中國西南部，後者是它最具體直捷的一種貢獻。此外，並使飛越駝峯的路綫向南移動了一些，不必像以前那樣飛越極高的高度了。

假如北緬不能藉史迪威將軍的作戰而將日軍肅清，要每月空運三萬噸以上的貨物到中國來，或許是不可能的，但是



假如沒有緬甸的作戰，那麼我們的全部力量都可用於中國本身，而不是僅用極小的一部份了。

我們也不致在正當日本即將失敗的前夕失却中國東部。爲了這種說法看來頗似事後的猜想起見，我必須補充說明一點，就是正當我們的戰略在擬定的時候，我就是這樣想的。我甚至相信縱使我們把大部份的力量放在緬甸，我們還是可以保持中國東部的。

我們失却中國東部的原因，祇是爲了力量上稍差了一點。假如幾百噸供應品能在適當的時間送達適當的地方，局勢就可以挽救。

我對於史迪威的設計，祇可能有兩種困難的解釋：或者是他以爲把緬甸來交換中國東部及其前進空軍基地是值得的，或者是在進行北緬作戰之同時，根本沒有增強中國內部的遠見。

我們在華最簡單的軍事目標，就是要支持中央政府，後者自一九三七年以來曾牽制日軍百萬以上，因此當美國遠征軍需要在亞洲大陸上岸的時候，可以得到它的合作。

在一九四四年初日軍發動攻勢之前，戰區司令部對於中國內部局勢，從沒有健全的估計。縱使在攻勢發動之後，我的司令部所屢次提出的警告和建議，還是一直被忽視或低估的。

戰區司令部和中國司令部的合作關係，是不充份和緊張的。對於防禦自由中國的軍隊，美國的具體援助並不存在，祇支持了一個小規模的空軍，而後者的效能又不斷爲其他方面爭取駝峯空運供應品而遭障礙。

一九四四年二月，我警告史迪威將軍說日方似乎即將發動空中攻勢了。敵人的空中活動，乃是即將發動攻勢的第一個可得到的徵象。

在三月中，我要求獲得來自駝峯的供應品，藉以支持對敵人船隻的攻擊，以及維持中國東部空軍基地的實力。

我在三月中屢次請求，在四月中又屢次警告，且出諸更具體的方式，因爲當時敵人發動攻勢的意向已愈來愈明顯了。但史迪威將軍對於這些預先提出的警告所作最好的答覆，就是我們應以手頭所有的辦法，盡力做去——而實際上。這種辦法實在少得不堪。

## (十五) 中國東南部的危機

一九四四年，日本在中國自南至北開闢了一條大陸走廊，也就將滿洲與東南亞被征服地區——印度支那，暹羅，馬來亞和緬甸接連起來的一條交通綫。

現在，從歷史的遠景看，這一個努力不過是一個已受致命創傷的敵人在臨死前的一種掙扎，但在當時，幾乎清算了中國國民政府的抵抗以及在中美戰時合作情形下美國三年來所作的投資。

對於這個攻勢，並未定出有效的計劃，用以對抗它的力量，僅有規模微小的第十四航空隊，羽毛未豐的中國空軍以及從沒有得到一噸美國援助的中國軍隊，後來縱使有一點，也已失之過遲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當我第一次就敵人的威脅向史迪威將軍提出警告之時，我要求在三月份中以燃料，彈藥與其他供應品八千噸供中美飛機之用，而我實際獲得的，不到此數之半。

四月中，適在攻勢變動之前，我提出抗議，認為這種交貨辦法無法使物資存儲，勢將使我們對日本船隻，機場和交通綫日益有效的攻擊，陷於停頓。

當時，對日本船隻的攻擊，已超過試驗階段。敵人的商船約五萬六千九百噸以及噸位兩艘已被擊沉，其中一萬六千七百噸大致是由第十四航空隊於一月間被擊沉的。我們具有每月至少擊沉日本船隻十五萬噸的希望。同時具有雷達設備的B——二四型機正準備掃蕩中國海，遠達菲律賓。

但是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貨物噸位上的限制，使支持中國軍隊防止日軍即將發動的攻勢所必需的物資，無法存儲起來。我力言敵人的進攻將威脅整個自由中國的安全，包括在四川省成都附近當時即將完成的B——二九型基地在內。超空堡壘基地的空防，已完全交付予由我指揮的第十四航空隊。

史迪威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聯合參謀部對於駝峯供應品並不給我優先享有權，因為日軍在緬甸方面的遠征行動，依然威脅着印法爾以及在印度勃拉瑪普脫拉山谷的駝峯空運基地。事實是史迪威的緬甸作戰需要駝峯的供應品甚多。

史迪威對我說，中國境內的空軍活動祇有加以減少。

已往的記錄將顯示我對於日軍攻勢性質所作的預測，相當準確，後者係於四月間在河南省的黃河流域發動，而在下一個月復在揚子江南岸的湖南省發動。

由於我要求的三月份的八千噸被削減幾達一半，四月份的要求又被削減得幾乎一樣厲害，所以我建議首先把四月份的數量恢復，五月份至少要八千噸，而以後則每月增至八千噸。

此外，我還提出一個變通辦法，主張把堆積在成都附近以備B——二九型應用的燃料暫時分派出來應用，並且假如未來的緊急局勢有此需要的話，那麼應以中國境內戰略攻擊代替B——二九型準備發動的對中國周圍地區的攻擊。

我坦白地對史迪威將軍講，除非按照上述辦法之一採取行動，那麼勢須通知蔣委員長一點，就是 he 不再能依賴我們的空軍對他的軍隊作有效支持，同時並通知華盛頓，說明整個中國安全受到嚴重影響了。

史迪威的答覆還是說印度內部的危機，使改進駝峯空運增加對華供應無法實現，蔣委員長不應該期待第十四航空隊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這次交換意見之後，我却夢到了我自從擔任駐華美國高級空軍長官以來最奇怪的命令之一。

這個命令使保衛成都區成爲第十四航空隊的首要任務，甚至放棄對敵人船隻的攻擊以及對中國地上部隊的支持，亦所不惜，雖然中國的地上部隊當時正面臨着最大的考驗。

這個命令，是以中緬印戰區美國空軍印緬區指揮官史屈拉梅益將軍的一封信的形式送來的，但是信中說明史迪威亦持同樣意見。

這個指令的表面理由，就是我會經對我方防禦B——二九型基地的能力表示懷疑，而我實際上所需提出的，乃是整個中國的安全問題。我從沒有提出單單關於成都基地一方面的防禦問題。

在那時候，昆明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部和駝峯路綫的中國主要終點正以一個戰鬥機大隊加以防衛，而有兩隊戰鬥機則正在保衛成都，所以成都的防衛要比昆明來得強些。

一向來，第十四航空隊的主要任務就是防衛中國方面駝峯路綫空運終點以及在空中支持中國地上部隊。我被迫向史

迪威指出這一點，希望他不要以相反的命令來束縛我的手腳。

我向他保證成都區的空中防禦，以與協助阻止當時在河南展開的日本攻勢以及準備支持不久即將渡過怒江前往緬甸的中國遠征軍相較，簡直是兒戲。

那一種軍事上的巧合是值得提出的，就是說當時中國最精銳的軍隊即怒江遠征軍，在史迪威的壓力之下正要在中國國境之外從事作戰，而日軍却已經開始在切斷中國的東南部了！

當中國境內的危機爆發之時，史迪威和史屈拉梅益却在談成都區一地的空防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史迪威最後把這件事情不提了，意思中間却說我以前在無謂叫鬧。

他曾在緬甸某地過一些時候。他在那裏發出一個無線電報，其中以諷刺的口吻說，他發覺成都的空防問題並不存在，「頗以為慰」。這一點似乎使他很滿意，因為他對中國的危機始終保留行動，直等到幾個月之後，那時中國東部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 (十六) 保衛衡陽大挫日寇

在對日戰爭中，負責對華軍事供應的美國人，把大部份的供應品用於軍行開放緬甸，而當一九四四年間中國局勢成為危急之時，他們的幫助已經是太少和太晚了。

一九四四年日軍的一個目標，就是要從滿洲經中國到東南亞開闢一條內陸交通綫，這一點最後終告實現。日方成功的記錄，也就是美方不聽警告和不接受請求的記錄。

在五月底，中國的局勢已經惡化到如此程度，假如不使用經駝峯運入以供成都附近基地方面B二九型機在未來作戰中應用的燃料——同時假如不使用超空堡壘以打擊日軍在揚子江南岸的攻勢根據地漢口的話——簡直沒有阻止日軍攻勢的機會。

遵照聯合參謀部的指令，戰區司令史迪威握有宣佈緊急狀態以及對第二十轟炸大隊和戰區司令部的其他資源作緊急

使用的權力。在五月中旬，我電告史迪威說，緊急狀態已經迫在目前了。

我建議他規定一個宣佈緊急狀態的限度，藉使事前還有一些策劃的時間。對於這一點，他用一種暗示來答覆，說這將使中國人完全依賴我們。在危機成爲「的確確」之前，他不預備宣佈緊急狀態。

這個電訊是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發出的，恰巧在日軍揚子江南岸的湖南岸發動攻勢的前一天。

我沒有其他辦法，祇能使第十四航空隊和中美混合空軍大隊傾其所能，實行攻擊，而同時重申災禍迫近的警告。我提撥付更多供應品的要求，藉使這少數的飛機還能繼續作戰。我們的警告和請求並沒有產生具體的結果。直到六月中旬，戰區司令部也不得不承認災禍已迫在眉睫了。

四月下半月和五月上半月，揚子江北岸的河南省已爲日軍所攻破，作爲揚子江南岸湖南省攻勢的前奏。六月五日湖南省省會長沙遭日軍攻擊，而於兩星期陷落。長沙是上一次日軍較弱的攻勢碰壁的地方。

要在河南阻止日軍是沒有辦法的，但在湖南則不然。在湖南，我們有堅強空軍部隊。祇要有少量的武器和供應，中國軍隊就可以有很好的表現的。此點對於自長沙南至衡陽駐守的薛岳部隊，尤爲準確。

我相信祇要在四月和五月中每月增加空軍的供應二千噸，就可挽回揚子江南岸的局勢。這個數量，祇比因發動怒江——緬甸作戰而使我們失却的空中供應，稍爲多一些。

日方在湖南使用的軍隊，大部份先調到揚子江方面，然後從漢口區向南發動攻勢。漢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揚子江是他們的供應綫，兩者都易於遭遇空中攻擊。四五兩月每月如能用去二千噸的燃料和軍火於空中攻擊方面。即可在攻勢開始之時，使敵人的力量削弱，使它步驟零亂，銳氣頓挫，對於武裝欠佳的中國軍隊是很有利益的。

薛岳部隊保衛衡陽四十七天的情形，支持這種信念。但是戰區司令部方面於日軍第一次發動攻擊的時候，就把衡陽當做已失去，而自確上院位已失去三說不待日軍部上戰事。

當日軍的戰隊於六月五日開始針對長沙的時候，史迪威離開緬甸，親自來注意一下中國方面的局勢，原來史迪威爲了打通緬甸公路之故，已經留在緬甸有幾個月了。他到昆明時，避不與我舉行會議，而即飛到重慶去和蔣委員長會商。

在重慶，史迪威最後同意增加第十四航空隊的供應到我所建議的程度。他在返歸緬甸途中在昆明逗留一刻，把這個決定告訴我。他逗留的時間這樣短促，致使我們無法考慮和增加對華空運供應同樣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怎樣把供應品沿失修的交通綫向東運送到我們的空軍基地去。

### (十七) 遇事猶豫貽誤戎機

當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將軍於一九四四年最後承認中國的軍事危機之時，他在協力挽救美國在中國東部的空軍根據地和不以供應品給予中國的保衛者藉以羞辱中國政府之間，猶豫不決。他在兩種辦法方面都沒有處理得好。

當一九四四年六月他最後認可我所提的增加空軍供應的要求之時，我指出了用B——二九型機進攻日軍在湖南方面攻勢的主要根據地漢口的必要。我力促儘速實行，甚至把它當做超空堡壘的第一任務，雖然它們預定的工作是從中國西部的前進根據地開始長距離轟炸。

六月六日在我司令部中所舉行的一次會議席上，史迪威對於這個建議一半表示接受。我的意思是說，第十四航空隊將追隨超空堡壘進行攻擊，以全部力量對付敵人，協力去擊破日軍的根據地，並且幫助中國軍隊在湖南組織有效的防衛。當我建議B二九型直接採取行動時，史迪威說他將在他的緬甸司令部去處理這樁事情。

他的確向華盛頓請示過，但是他這種辦法並不能表示除了向華府請示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以使事情從速辦理。事實上B——二九型並沒有轟炸漢口，直到六個月之後，那時候日軍已經由中國東部開闢了一條大陸走廊了。後來B——二九型機的轟炸縱使很成功，也不過是亡羊補牢而已。

但是史迪威的確於六月八日宣佈緊急狀態已存在於中國。在那時，就得動員幾乎是中國方面全部可以動用的供應和運輸工具。但是，由於中國內部的運輸久被忽視，尤其是從駝峯空運終點昆明到湖南省內空軍根據地這條交通綫的失修，這最後一刻的努力也失却了效能。

職是之故，從印度的第七轟炸大隊方面派遣B——二四型把燃料向東裝運，已成必要。大量的汽油就消耗在空運方面，而實際上假如陸上的運輸有辦法的話，這些汽油是可以用於作戰方面以應付日軍的攻勢的。

向東的交通綫之不能維持，致使我們不得不把我們在中國東部的少數中型轟炸機實行撤退，而使戰鬥機活動限於空軍基地的防禦方面，雖然那時候——從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八日——正是衡陽之戰達到最高峯，急需空軍的支持，而也是唯有空軍的支持，或許可以挽救這個軍略中心的時候。

在衡陽被圍的第一日，我建議把第十四航空隊的輕便自動武器和若干種步兵武器一千噸給予薛岳將軍。我確信假如能把小量的援助給他，他是會繼續作戰下去的。

戰區司令部慎重地把這個建議加以考慮。於是史迪威承認有採取激烈行動的必要，但是他的意思是想接管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根據重慶方面的消息，史迪威拒絕了我的建議。戰區司令部相當隱諱地發出了一個消息，說是史迪威正在草擬一個「建議」，這個建議將羞辱中央政府，並且表示在他的建議被接受之前，他不願意援助中國東部的地上部隊。

同時，在重慶的戰區司令部方面的負責官員，開始隨便談論一點，說第十四航空隊負責着保衛中國的東部而不得到中國人的幫助，而當時危機就是這樣造成的。

這種隨便的談論完全忽視了我已往所提警告和請求的記錄。此外，戰區司令部方面人士在重慶英大使館的一次宴會席上，又隨便談論中國方面「撤退戰時首都的計劃」。有一個健談的美國軍官曾經猜測中國政府是否將遷入中國內地或者遷到新德里去。

在七月下半年，當衡陽還在英勇抵抗的時候，我要求派運兵飛機把軍火和醫藥供應品投擲給衡陽的守軍，以應他們屢次提出的請求。史迪威在答應這個要求的時候，把他已往對中國及其困難處境的態度，總結地說了一遍。他說從空中投擲供應品的結果，將引起投擲更多供應品的要求，無法予以滿足，所以他「不願意供給飛機」。

七月下旬，戰區司令部的態度，以為中國東部是已經失却了，官方曾經這樣表示過。戰區司令部方面不願它未以物質援助給予中國東部的軍隊及其忽視陸上運輸以至空中運輸的事實，以為再度對中國方面實行「威脅，請求，譴責以及不容氣對待」的時刻已經到臨了。但是縱使要做這種事情的時間，也已經沒有。

戰區司令部會想從九月份起把從陸路運赴中國東部供應品增至每月六千噸。假如能够早一點就這樣做，日軍的攻勢

是可以加以阻抑的。但是這個問題已經遷延得太久了。  
中國東部終告失却。

## (十八) 戰時合作最後一年

史迪威將軍於一九四四年被召回後在我們和中國戰時合作最後一年中的情形終於證明我們和蔣主席及其政府相處，是有合理和有效的方法的。

在魏德邁將軍繼史迪威擔任戰區司令之前，爲史迪威辯護的人總說中國方面的情形，需要史迪威所慣用的「懇求，諷責和不客氣相待」的老辦法，但是這種辦法對於史迪威的繼任者，却並不認爲必要，並且在我看來，它們之所以對史迪威成爲必要，乃由於他的偏見所造成。

我認爲在史迪威指揮之下的戰區司令部已往整個不幸的記錄，是可以使它成爲中美關係上光榮的一章的。我尤其認爲一九四四年中國東部的悲劇，以他當時可以動用的物資而論，是可以加以避免的。

當桂林和柳州的命運——因此也是中國東部的命運——已因日軍的攻勢而告決定時，戰區司令部雖頗不願而終於允許以五百噸的供應品給予上述兩城的防衛者。這是在史迪威任內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給予中國地上部隊的直接援助，而在時間上又如此之遲，更足以說明他先前的缺點。

魏德邁的辦法完全證明這一點。在中美戰時合作剩餘的一段時間中，魏德邁在互敬的立場上處理對中央政府的關係，結果使一九四二——四四年所造成的禍害，減輕了不少。

他把戰區司令部先前和中國領袖的仇視關係加以埋葬，此外，復在對日戰爭剩餘的一段時間中，把先前對中國共產黨公然的鼓勵，加以埋葬。但是我們對中共加以鼓勵的奇怪態度，後來又復活過來，直到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八年才逐漸死亡。

爲了有些人或許要辯論，以爲在中國東部失却之後魏德邁並沒有面臨和史迪威所面臨的類似問題之故，我們值得指出這一點，就是日軍於一九四五年夏季向湖南省我方前進空軍根據地之一芷江所發動的攻勢，曾引起相似的困難。

當時實際從事作戰的中國地上部隊，都不是由美國人訓練或配備的，但是在日方攻勢展開之時，他們獲得了緊急援



助。地上部隊對空中補給的依賴是很大的，但是這一次他們却獲得空中補給至最大限度。

總之，魏德邁決定芷江必須予以據守。他獲得了中國領導方面的信心而非動搖他們的信心。他幫助地上部隊獲得活力，予以指導，而並不想獲得指揮權。

結果，日軍被擊破或被逐出，芷江得了救。雖然美國訓練和配備的在緬甸方面戰績卓著的新六軍會空運到芷江來作爲後備部隊，但是並未有參加作戰的需要。

可是我們對華這種新關係來得很遲，華盛頓對於中國多少已存有成見。不然，我確信我國戰後的對華政策是決不會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南京政府的。

我覺得馬歇爾國務卿戰後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大部份受史迪威報告的影響。他在仲裁方面的努力，不自然而然地落入中國共產黨和侵略性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圈套。

當時我相信如此，以後的事態的發展也證明這一點。史迪威和中國共產黨的「公開調情」，沒有比他離華九個月後所發生的一樁事情表現得更清楚的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也就是日本最後崩潰的大約一個月之前，當時史迪威在沖繩島擔任美國第十軍司令，提出了一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計劃，後者會引起華盛頓相當的注意，結果把它向魏德邁轉達，請他表示意見。

當時我已經退休，不再擔任第十四航空隊的司令而在重慶休息，所以我得悉了這件事情。

概括言之，史迪威的建議乃是說第十軍部隊應在上海之北的江蘇省海岸登陸，以與中國共產黨軍隊獲得接觸，把美國的軍火和藥彈給予共產黨，讓他們向日軍佔據的上海進攻。

這個建議在重慶方面暗中引起了一種騷動，或許包括中央政府提出緊急抗議在內，結果它並沒有被實施。不用說，在戰爭結束時由共產黨佔有上海，等於把中國的心臟區揚子江下游交給共產黨。

在我們過去對華十年的關係中，我們走過一段險峻的路程。困難還沒有過去，但是我相信我們已經跑過了十字路口，已作了準確的選擇。在獲得適當的指示之後，美國人是知道怎樣去找尋準確的路徑的。

但是我們的確已經蒙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其中最要的就是時間，歷史彷彿像嚴厲的教師一樣，將會告訴我們是否已經遷延過久了。（完）

一切一旅高用效質品



膏牙龍治消

疾口消 牙化首  
病腔治 膏學創

售出有均



房藥國全

行發廠藥製學化誼信

每册定價國幣伍萬元

外埠另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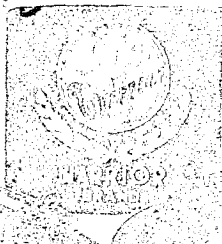
發行	編譯	印刷	經售
者	者	者	處
中	申	中	全
報	報	報	國
館	編	館	各
	譯		地
	室		中
			報
			大
			書
			分
			館
			店

民國卅七年四月初版

F972.2  
0863



春光明媚中遊覽  
名勝請即購備  
回力特製跑鞋或  
回力萬里鞋既切  
實用又合乎經濟  
之道輕快舒適較  
普通皮鞋妥善萬  
倍尤於山路崎嶇  
中更覺非此不可



上海書畫店

冊數 1

售價 0.30 正泰信記橡膠廠出品

上海中正路五號 廠址：上海大連路

2103